

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聚焦社区,记录疫情下的人情冷暖与悲欢——
一个有伤痛、有爱、有光的城市



《被遗忘的春天》海报 制片方提供

本报记者 陈俊宇

3月11日晚上8时许,纪录片导演范俭发了一条朋友圈,“到了”,定位武汉。

“作为拍纪录片的人,应该去现场。另外,我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对那座城市有很深的情感。”

直到3月,范俭受邀拍摄纪录片。当时,武汉疫情已经渐趋稳定,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但疫情防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范俭选择将镜头对准少有影像记录的社区。4月13日,拍摄杀青。“武汉是一个有伤痛、有爱、有光的城市,祝福仍旧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范俭将对这座城市经历的“爱与伤痛”放进了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近期,该片已在部分视频平台上线。

社区,最想进入的地方

丹水池街道丹东社区,是疫情中武汉城

阅 读 提 示

疫情暴发之后,很多创作者进入武汉,拍摄与疫情有关的纪录片,像是处于一个巨大的考场里,完成一场“命题作文”。而纪录片导演范俭将镜头对准了少有影像记录的社区,意图拓宽观察疫情的另一种视野。

区确诊病例较多的社区之一。

三千多户居民居住于此,大多是中低收入家庭。范俭将镜头聚焦在社区中的3组家庭。蔡大姐家因为老伴确诊新冠,一家人遭受“歧视”,她在不解和委屈中迎接老伴治愈归来;黄冲患肾癌已经3年,遇到疫情去医院治疗变得困难重重,他留恋妻子,想好好活着,在镜头面前大哭;社区副书记陈瑞面临受命成为负责人,她没日没夜地为社区服务,但居民还是不理解,深夜回家她控制不住发火,把委屈转移到7岁孩子身上……

“社区中、家庭里如何应对疫情?他们的生活如何开展?以及在这特殊时期人与人的关系会有怎样的变化?我比较在意的是灾难下的日常,这是我最应该拍的。”范俭说。

“当我到丹东社区看到小区空间、人群结构等都很丰富,很快就决定拍摄这个社区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社区刚好有一个临危受命的女性社区副书记。“我当时就想拍一个女性社区工作者是怎么工作的,当然也想透过她去拍摄她的家庭和更多的层面。

触动人心的情感,温暖且有力量

窗户外有一簇粉色的桃花,黄冲躺在床上,刚好能望到。

他的头深深陷在枕头里,动弹几下都显出吃力的模样。肾癌3年,如今到了晚期,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妻子杜进患有尿毒症,每隔两天就得去医院透析。

今年1月,黄冲被检查出癌细胞转移,准备住院治疗,因为疫情突然来袭,不能入院

了。躺在家中床上,他靠止疼药勉强度日。

这是一个重症患者家庭遭遇疫情后的境地:局面焦灼,束手无策。直到3月下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协调下,黄冲被安排上到医院做了CT。“我想活,我要活着。我很留恋她。”黄冲在镜头前泣不成声。

帮黄冲协调入院的是社区副书记陈琦。前阵子,老书记在岗位上因超负荷工作而病倒,她临危受命。范俭团队的拍摄就是从跟拍这位女性社区工作者开始的。而黄冲、杜进这对夫妻进入范俭视野,也是在一次拍摄陈琦过程中得知的。

在这个有上百万居民的社区中,社区工作人员仅仅13人。陈琦负责与社区内确诊及疑似病例人员的对接,兼任生活物资的发放。两部手机在身,铃声整天几乎不间断响起。没有周末,睁眼就是上班,天黑后才休息。

在片头,蔡大姐和病情已经好转、在医院隔离的丈夫老潘通视频电话,对丈夫说:“你再不好,我真的要崩溃了。”一个月后,老潘终于回家了。蔡大姐再三叮嘱他,虽然治愈了,但如果想散步,最好晚上10点以后再出去。面对疫情,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与隔阂,被真实呈现。

疫情之中,有太多可以选择的表达空间与对象。进入武汉的每一位纪录片导演都在选择各自的视角,范俭的目光锁定在容易被忽视的角色:确诊者的家属、身患重症的病人、忙碌的基层工作者,而这背后是太多看不见的人情江湖与悲欢离合。

“我喜欢人情中细腻的日常和绵密的关系,喜欢去发现人与人之间那种触动人心的

情感。这样的情感不仅温暖,而且很有力量。”范俭告诉记者,“影片中蔡大姐一家三口,就是典型的我喜欢的家庭。你能在日常中感受到这个家庭相互关怀,彼此默默地爱着对方。这种情感,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

越是个体的记录越有价值

《武汉战疫纪》是首部关于武汉战疫的纪录片,真实回顾了武汉“封城”1个多月来发生的故事;纪录片《在武汉》将镜头聚焦到“封城”后武汉普通人日常,比如由出租车组成的志愿者车队、免费给自己小区送菜的大姐等;日本导演竹内亮拍摄的《好久不见,武汉》则记录了武汉“解禁”之后,10个当地人的10段故事……

纪录片在重大的灾难性事件中,有一个属于它的角色定位,每一名创作者都有着自我的理解。

“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记录和在场,留下一个档案。”范俭这样认为,这些档案必须是有作者态度的,必须是有独立性的,“越是个体的记录越有价值,越是个体,越有个人的体验和思考,而且又是多样的。”

范俭曾经执导过纪录片《活着》《十年:吾儿勿忘》,关注的是汶川地震后的家庭重建、人的创伤治愈以及震后一代新生命的成长。“在这样一个巨大灾难后,有很多人需要承受巨大伤痛,这种修复和治愈需要漫长的过程,应该被记录下来。”范俭说。

《被遗忘的春天》关注的是疫情下的社群关系、邻里关系以及家庭内部关系,已经不再是之前创作的延续。范俭明白,在疫情这一问题创作中,更需要冷静思考,“我想用更为抽离的、冷静的方式去面对灾难这个主题,不想总是用一种离得特别近的方式去看。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我可能会再去武汉拍一部影片,再拉开一点距离,应该还是纪录片。”

G 视线

“中国荧屏第一人”逝世

再见,沈力老师

本报记者 苏墨

7月28日,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节目主持人沈力老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对于年轻一代,沈力的名字似乎有些陌生,但在主持圈里,她可以称得上是“祖师爷”,曾制造多个“爆款”节目。1958年5月1日19时,黑白电视机屏幕里出现了播音员沈力的笑容。在一间办公室改装成播音室里,作为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播音员,25岁的她在一个小时里,完成了五套节目的播报。

在很长时间里,她独自承担央视全部的国内国际新闻、文体节目、专题节目等播音,以及天安门节日庆祝实况、大型文艺晚会等转播任务。尽管当时中央电视台发射半径仅有25公里,仅能覆盖全北京市30多台黑白电子管电视机,但沈力始终精神饱满,字正腔圆。

1959年,国家广播事业局决定扩招播音员,选择对象是各大中学在读的学生,沈力作为招考员,一眼看中了年仅17岁的赵忠祥,“新中国第一位男播音员”在她的发掘下诞生。不仅挖掘了赵忠祥,在很多主持人心中,沈力都是“母亲”“典范”一样的存在: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将她视为中国主持人这个大家庭的“母亲”,敬一丹说她是“主持人业务上的标杆”;朱军、曹可凡、张泽群,都将她当作恩师。

半个世纪的播音主持生涯里,沈力永远是勤勤恳恳、永远满怀热情拥抱新事物。1974年,沈力主动申请离开了播音主持岗位,开始做电视专题。1982年,49岁的沈力接到通知,由她来主持一档服务类节目《为您服务》。节目开播后,沈力每个月都会收到3000多封观众来信,最多时能有5000多封信,她几乎每封必看,还经常回信。这个节目彻底改变了当时的电视节目表达方式,将过去硬梆梆的告知变成亲人般的温暖服务,沈力再次给中国电视节目立起一座里程碑。

退休后的沈力,更忙了:讲学、带研究生、当比赛评委、做节目编导……1993年,央视为老年群体开办了《夕阳红》栏目,特意返聘沈力来主持,开播半年,《夕阳红》便成为白天收视率最高的栏目之一。

病逝前,沈力已经与病魔抗争5年,长年卧床。她曾在朗诵会上分享的一句话:“若不得不分离,也要好好地说一声再见,也要在心里存着感谢,感谢她给了你一份记忆。”如今,她成了那个需要被感谢的人。再见,沈力老师;感谢您留下的一份份美好记忆。

《盗墓笔记》重启,超级IP再孵化

本报记者 兰德华

在中国影视界,有个怪圈:但凡出续集,多半是要扑街的。相形见绌,在欧美,续集集到五六七八部的,屡见不鲜,虽口碑不一,当总体能保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一个题材的卖点,编剧以“敲骨吸髓”的精神,挖得近乎一点不剩。

7月15日网上首播《盗墓笔记》续集——《重启之极海听雷》,播出一周,豆瓣评分超过8分,位居“一周华语口碑剧集榜”榜首。这似乎让我们看到国产剧的另一种“破圈”可能。

作为暑期档人气新剧,瞄一眼其主创阵容,不可谓不“豪华”。当红小生朱一龙领衔主演,女主则是最近在另一部热播剧《三十而已》贡献了不少戏份的毛晓彤,更有“硬汉+实力派”的胡军加盟。如此“混搭”,让这出大戏,看点颇足。

作为“盗墓”系列原著作者,写网文出身的南派三叔担任监制及编剧,对于广大“稻米”(《盗墓笔记》粉丝)而言,分量不必多说,你叔本身自带流量。

9年前,《盗墓笔记》小说完结,其热度与天下霸唱所著的《鬼吹灯》难分伯仲。然而,与之相比,《盗墓笔记》在超级IP孵化的路上,一骑红尘。

一组数据值得关注。截至目前,《盗墓笔记》实体书销售已过2000万册。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季播剧,播放量达43.2亿,电影票房10亿元。此后,季播剧盗墓笔记少年篇《沙海》、前传《老九门》分别斩获55亿、119.8亿的播放量。除了影视剧,“盗墓”系列衍生出的话剧、舞台剧巡演超10年。如此成绩,离不开被原著俘获“芳心”的庞大粉丝群体,以及强大的粉丝粘性。

南派三叔微博粉丝量就超过了1200万。此外,在百度盗墓笔记吧、QQ盗墓笔记部落、微博粉丝矩阵也有数百万粉丝。“盗墓笔记”微博相关话题总阅读量达70亿。

原著中主角吴邪与张起灵青铜门前“十年之约”,是每年的8月17日,而现实中,这一天更成为了“稻米”的节日。被孵化出的品牌活动“八一七稻米节”,其影响力,日渐扩大。

至此,超级IP孵化的两条相互依存的路径清晰可见:由原著开发出的剧集、电影、舞台剧、粉丝节等衍生品的深耕与挖掘,以及依托原著的影响力在各大社交媒体凝聚起粘性极高的粉丝群落。

这是一个鸡生蛋,蛋孵鸡的过程。精良的内容与创作,吸附了庞大的粉丝群体,而粉丝的“买账”进一步刺激了IP的再孵化与再生产。

目前,《盗墓笔记》系列IP已分裂出近10个子项目。而现在热播的《盗墓笔记重启》正在开发中的子项目之一,该系列的《藏海花》《藏海戏麟》的开发也已提上日程。

南派三叔和《盗墓笔记》的故事尚未结束,“稻米”们还在屏幕前如饥似渴地等待着该剧的准时更新。而“超级IP”孵化的种种神话,还在不断上演。

小朋友安置点上非遗文化课

7月30日,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太平寺小学防汛安置点,剪纸艺术老师正在教小朋友学习剪纸。

据悉,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文旅局组织文艺志愿者来到该区受灾群众安置点太平寺小学,向转移安置在这里的小朋友教唱黄梅戏、传授剪纸技艺,让小朋友们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项顺平 摄/人民图片



G 艺评

“被五条人笑死”的那个晚上

刘颖余

“被五条人笑死”的那个晚上,五条人乐队冲上4个热搜。

的确是火了。

主唱仁科大概也没想到以这种方式火。那个晚上后,他的绰名“农村拓哉”和“郭富县城”不胫而走,他要是几天不刮胡子,可能还会多个雅号“海丰弗雷迪·莫库里”。

这一周,“被五条人笑死”已成为一个大家久玩不厌的梗,这6个字在热搜榜上一挂就是两天。

有关此梗,还需要简单“科普”一下。

简单点说吧——7月25日,乐迷望眼欲穿的《乐队的夏天》第二季首播。第一轮竞演,五条人乐队临时换歌,导致灯光和字幕都没跟上,结果被淘汰。淘汰就淘汰呗,没承想互动环节,主唱仁科金句

迭出,加上其“农村拓哉”“郭富县城”的范儿,场内场外一通欢乐。有人开玩笑,要是投票前来这一段脱口秀,估计五条人绝不会被淘汰,可惜了。

仁科也觉得可惜,不过他可惜的是《乐队的夏天》。五条人被淘汰后,他说这是“乐夏的损失”,临走他还安慰跟拍导演,“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这句话,又让他圈粉无数。

看起来五条人不仅好笑,而且似乎还有点“嚣张”。

五条人的“嚣张”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这些年,他们从没有大红大紫过,却也是圈内独一无二的存在。这支来自广东海丰县的乐队,一直坚持以方言做自己的音乐。有人就说了,“贾樟柯的早期电影、曹寇的小说,五条人的叙事民谣,这些都是从县城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奇异之花。”听听,够可以的吧。

“被五条人笑死”登上热搜,然而,也有为数不少的人在他们的音乐里痛哭。五条

人在参加比赛前,就被台湾作家马世芳视作“中国大陆最厉害的乐队”,被南师大文学院教授何平称为“中国最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乐队。艺术家陈鹤甚至认为,五条人“应该获得鲁迅文学奖”。

有趣的是,这么多年来,五条人似乎从未想过“自己为什么不上红”“自己该怎么红”。他们不焦虑,不故作,不讨好大众。这也是他们在《乐队的夏天》首场竞演就临阵改歌的原因。

五条人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他们太知道了,但他们就是要坚持做自己,不愿意被导演和节目组设计。“做人不能太精明”,这是他们一贯的信条。

我想,这也是五条人让我们感觉好笑的原因。如今的喜剧节目,多不好笑了,原因就是他们太装了,太做作了,于是显得不那么诚恳了,当然就很难打动人。而仁科和阿茂,最可贵的特质就是“不装”。

不装,才能创作出好歌,不装,才能出

来幽默感。

“被五条人笑死”的那个晚上,仁科和阿茂其实也不经意间给中国喜剧人上了一课。

当然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去抢喜剧人的饭碗。人家仁科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自己最需要干的是什么,最擅长干的是是什么,“我唱歌我很享受,我演出我很享受,我录专辑也很享受,但如果要我天天想笑话,我不是干这个的。”是啊,不能拿自己的爱好去比拼别人的专业。

也不必期望复活赛什么的。像《乐队的夏天》这样的节目,本来就是一场秀。赢得比赛又如何?去年获得冠军的新裤子乐队,专辑只发行到2016年,演唱会只开到2018年,2020年除了当过一次周深的帮唱嘉宾之外,到目前好像也没干什么了。

所以,笑过之后,还是让五条人继续去做他们的音乐吧。